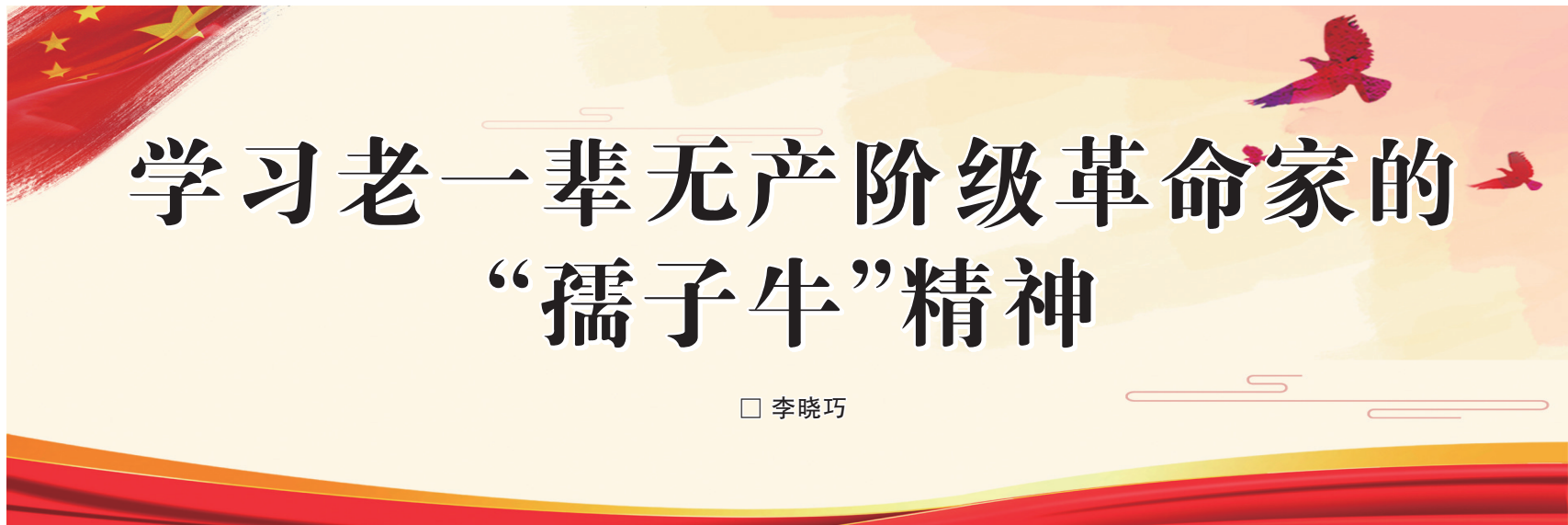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这是鲁迅先生自况诗。同时，鲁迅还有一句跟“牛”有关的名言：“我好像一只牛，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牛奶、血。”这两句以“牛”自比的诗句将鲁迅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。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非常高。革命战争年代，中国共产党人以“孺子牛”的精神毅然担当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、创建新中国的重任。党的历史证明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“孺子牛”精神的忠实践行者。

“延安五老”是延安时期对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谢觉哉、吴玉章等五位老同志的尊称。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，是大家学习的榜样。对他们忘我的勤奋工作，毛泽东非常关心，曾写信致谢觉哉，信中说：“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，亟宜有所调节，务不过劳”。1937年1月30日，毛泽东给徐特立的信中，称赞徐老：“你是革命第一，工作第一，他人第一”，“你总是拣难事做，从来也不躲避责任”，“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”。这是对徐老一心为党、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评价。

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，革命者以扩大生产、厉行节约为荣。在大生产运动中，中央领导人都以身作则。毛泽东在自己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，种上了菜。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，开垦出三亩菜地。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，任弼时得了第一名，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。中央领导人的率先垂范起到极大鼓舞作用，当时延安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了大生产运动，卓有成效。1944年1月19日，毛泽东特地给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信：“林老：来示诵悉，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，你个人的计划能实



□ 李晓巧

行，必有好的影响。我也定了一点计划，准备实行。”

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、呕心沥血，建立新中国后，虽然身居高位，但依然保持着为国为民、艰苦奋斗的作风，并通过言传身教，对家人和身边人严格要求。

毛泽东高度赞扬为国为民的革命精神，在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和发扬革命精神的同时，更是严格要求自己。他为国事操劳，日理万机，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口述：毛主席工作不分昼夜，不是根据时间来安排工作，而是根据工作来安排时间。毛泽东在饮食上非常简单，尽管物质条件好转了，依然厉行节约，“好了么，四菜一汤。差了么，一碗面条”。工作繁忙时，24小时一般吃两餐，有时只吃一餐饭，感觉饿了的话，就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一缸麦片粥，就着生活秘书做的霉豆腐喝下去。

1949年，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从湖南老家写信给毛泽东，请他帮忙安排工作。想到为革命牺牲的爱人，想

到对他个人和革命事业都有很大帮助的杨家，从个人感情上，毛泽东应该帮助妻舅，但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、人民的领袖，毛泽东回绝了杨开智的要求。1949年10月9日，毛泽东致电杨开智：“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，不要有任何奢望，不要来京。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，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，不要使政府为难。”做人民需要的工作，这就是毛泽东对亲戚的要求。

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来信。他每天都亲自阅读人民群众写给他的每一封信的摘要，重要信件还要仔细阅读全文，指示处理意见，有时提笔复信，常常用商量的口气，帮来信群众想办法解决问题。并且，毛泽东还虚心接受群众提的一些建议。如1957年初，毛泽东的18首旧体诗词发表后，先后收到了复旦大学学生和江苏泰县一位小学校长写给他的信，分别提出了他的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词中“把酒酹滔滔”的“酹”字，是“酌”字之误；写给臧克家等同志的复信中

“遗误青年”的“遗”字，应该是“贻”字。毛泽东欣然接受，让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来信人复信告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。同时让《诗刊》编辑部将错字改正过来。他在人民面前的谦逊和认真，更加突显出一代伟人身上的“孺子牛”风范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都秉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“孺子牛”精神。

周恩来担任了26年的共和国总理，他承担的事务之繁难艰巨，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，每天睡眠时间极少，常常是“三更未眠五更起”。即便在1972年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，周恩来依然不离工作岗位，夜以继日地操劳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周恩来自觉地、始终如一地、模范地把共产党人的“孺子牛”精神和作风展现在世人面前，在人民心目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谢觉哉担任了内务部部长，他在湖南老家的儿子和亲友们，都希望在北京“做大官”的谢觉哉能照顾他们走出农村，

到城里工作，但是谢觉哉一概拒绝了，还写信教育他们要安心农村生产劳动，学习新知识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1950年1月，谢觉哉在给湖南乡下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，“你们说我做大官，我官好比周老官，起得早来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”。他把自己比作老家村子里有名的勤劳长工周老官，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情怀，不为“做大官”，只求“多做事”。

1951年，谢觉哉给在湖南老家的妻子写信：“经过了一年，家乡当已知道我是在做‘工’，而不是在做‘官’。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，他不能多拿一个钱，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。”谢觉哉就是这样，一生都任劳任怨地勤勉工作，而且严格要求妻子、儿女和亲友们都踏踏实实做事，克服困难，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。

1944年1月，董必武写的《谢寿》诗中引用了苏轼的一句诗“我似老牛鞭不动”，实际上他当时的工作任务相当繁重，一工作起来就没日没夜，“晨鸡屡作声喔喔，反复叮咛报夜

阍”，为了革命事业和红色政权建设，董老殚精竭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不仅一如既往地承担着很多重要工作，而且教育后辈要“老牛负重耕荒地，斑豹韬文隐雾坳”，做一个对国家 and 人民有贡献的人。80岁时，董必武写过一首谢寿诗，诗中写道：“弩骥荷重难胜任，唯望鞭驱便凛兢。”董老以诗言志，以荷重前行的“孺子牛”的精神自励自勉。朱德曾写诗称赞董必武“为民服务以身先”。

最美的革命诗歌来源于革命的工作和生活。1975年，人民诗人臧克家有首咏牛诗写得生动传神：“块块荒田水和泥，深耕细作走东西。老牛亦解韶光贵，不待扬鞭自奋蹄。”用辛苦劳作、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形象，比喻勤勉工作、自强不息的老共产党员的奋斗精神。

“为党献身常汲汲，与民谋利更孜孜”，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写谢觉哉的诗句。实际上，这正是谢老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民族谋解放、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回望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，正是由无数具有“孺子牛”精神的共产党人筚路蓝缕、前赴后继、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国为民、隐忍负重、任劳任怨、勇往直前的“牛”劲和红色基因，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新时代新征程，不仅需要大批“孺子牛”，还需要无数的“拓荒牛”“老黄牛”，众牛奋蹄，齐头并进，我们的国家将会建设得更加美好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



明清小说的文心与雅趣

□ 余来明 赵雨薇

明清时期，小说作为游戏消闲之笔，阅读门槛较低，人们往往关注其故事性，而对其作为“文章”的艺术特征较为忽视。事实上，明清文人为了追求科举功名，往往需要刻苦磨励文辞，由此而作小说，在语言、情节、叙事上往往暗藏文心、别有乾坤，展现了文章才能。明清批评家常从为文角度评价小说。如明人胡应麟肯定《水浒传》之叙事，认为其“排比一百八人，分量轻重，纤毫不爽，而中间抑扬映带，回护咏叹之工，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”，肯定了它的为文用心。又比如金圣叹称赞《水浒传》“若其文章，字有字法，句有句法，章有章法，部有部法”，将它视作一部经典的文章写作教科书。因此，以读文章的眼光读小说，往往可以对其中蕴涵的文心与雅趣别有体会。

文心：结构之精与言辞之美

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典范，明清小说在叙事艺术和情节安排上做了很多尝试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，无论是短小精悍的短篇白话，还是鸿篇巨制的长篇章回，都包含精巧绵密的构思和厚重的文学底蕴。明清小说如何营造结构？如果说《西游记》代表了依靠中心情节支撑小说全局模式的成功尝试，那么《儒林外史》以主旨的逐渐展开来呈现情节的方式，则可谓独具匠心。小说以王冕故事作为这幅世俗风情画的开端，以市井四奇人的故事作为画卷的收尾。提笔“说楔子敷陈大义”，收笔追往思来，中段间杂世俗百态、各色人物，画幅缓缓展开，作家的社会理想也随之缓缓浮出。

清代的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提出“结构第一”之说，创立了关于结构的一套理论：“至于结构二字，则在引商刻羽之先，拈韵抽毫之始。如造物之赋形，当其精血初凝，胞胎未就，先为制定全形，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。……工师之建宅亦然：基址初平，间架未立，先筹何处建厅，何方开户，栋需何木，梁用何材，必俟成局了然，始可挥斤运斧……故作传奇者，不宜卒急拈毫，袖



《儒林外史》《三言二拍》读本

手于前，始能疾书于后。”以《儒林外史》等为代表的世情小说大多脉络清晰，精心安排人物命运与事件结构，或平铺直叙，或纵横交错，或突出主线，或网状布局，从而让作品情节跌宕起伏，奇趣横生。作者编排小说结构就像是在建造、打理自己的文字花园。各章回各有重点，自成局面，一如建筑中风景各异、相互独立的亭台楼阁，从整体看又是廊腰缦回、犬牙交错，各章回暗中关联交相错杂，形成整部小说的波澜。其间既含雄伟辽阔，又间杂曲折幽深。依靠这样的布置安排和造文之心，明清小说得以在尺幅之间，舒展历史风云，纵览历史人物，重演历史进程，而众多人物的安排也在历史洪流面前，显得详略得当，纤毫不爽，曲尽形容。

明清文人除了在小小说结构上独具匠心，在小说语言和艺术表现上也多含巧思。例如，董说《西游补》借助梦幻形式展开情节，讲述孙行者“入幻一历幻一出幻”的故事，是神魔小说的一大奇观，整个故事迷离恍惚，在叙事上也极尽荒诞诡谲。鲁迅对《西游补》的语言以及艺术手法大加赞赏，他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谈到这部小说时认为：“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，于宗教之痛之迹少。”“惟其造事遣辞，则丰赡多姿，恍忽善幻，奇突之处，时足惊人，间以俳谐，亦常俊绝，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。”此中行文落笔之间的文心，一方面是明清文人文学才华的展

现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心中感时伤事的历史烙印。

雅趣：雅集赋诗与清词丽句

明初统治者对文人实行严格的压迫政策。如果说文字狱和严刑峻法是一条有形的锁链，那么八股文则是一座无形的牢笼。在此境遇中，士人“外王”的功业追求难以实现，继而转向“内圣”的人格修养。求诸外，不如求诸心以达到自我满足，在文化精神的层面寻找一种新的出口，因此明代文人格格外钟情于俗务尘劳之外的雅趣。何谓雅趣？“雅”是相对于“俗”而言的，取高雅之义。“趣”的指向又是什么？“公安三袁”之一的袁宏道在《叙陈正甫会心集》中有一段关于“趣”的评论：“世人所难得者唯趣。趣如山上之色，水中之味，花中之光，……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，唯会心者知之。”明中叶以后，文人对这种雅趣的追求和演绎达到了巅峰，文人日常生活主要围绕“书、考、游”三者展开，冯梦龙《古今谭概·谈资部》第29指出：“古人酒有令，句有对，灯有谜，字有离合，皆聪明之所寄也。工者不胜书，书其趣者，可以侈目，可以解颐。”在世俗生活中，雅趣主要通过读书习字、谈禅论道、赋诗作画、抚琴对弈、养花植石、游山玩水等方式实现，又通常

与文人结社密不可分。

文人重雅，又往往与厌恶科举八股相互对照。雅趣不仅占据了文人的日常生活，更在文学创作里占有一席之地，他们将自己的闲情雅趣融入文字，以趣为尚，而小说创作也正是他们超出“八股道中”的意外之趣。《儒林外史》中就有大量反映文人结社聚会唱和的桥段。小说第18回《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》写了赵雪斋、支剑峰等人“西湖宴集、分韵赋诗”的情节，第34回《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》也有写众人听杜少卿解说《诗经》的场景。当然，杜少卿对《诗经》别具一格的解读，实际上出自小说作者吴敬梓之手。吴敬梓曾撰《诗说》，是研究《诗经》的大家，小说人物杜少卿也是作者自况。

明清小说除了写到文人雅集，还常会出现大量诗词，有的甚至是结构情节的关键要素。《醒世恒言》第11卷《苏小妹三难新郎》，写苏小妹与秦观的故事，处处以诗词唱和推进故事发展。这些诗句本身不仅是贯穿故事始末的骨架，还堆起了整个故事的雅趣之气，而这些诗句大多是创作者文心雅趣在文本中的投射，借小说人物代言，看似表现小说人物之才，实则小说作者自道。

传统社会的文人雅趣是文人把日常生活艺术化的一种体现，明清时期的文人把自己所读的诗书、所受的文化熏陶和艺术天才转化成一种渗透着文化气息的生活方式。这种雅俗结合的尝试，表面上看代表着他们舞文弄墨的闲情雅趣，彰显自己的文化优势，实则体现了他们与日渐崛起的商人阶层之间的文化竞争，以及对黑暗社会现实的逃避。所谓每当欣于所遇，便可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消解因俗世芜杂、穷途无路而生的孤独。后世者观之，既可从中窥得那一时代的文化表征，亦可察得历史趋势以及世道民风。



“夫风化者，自上而行于下者也，自先而施于后者也”。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、规范和习俗。家风与作风存在密切联系，好家风滋养好作风。家风既能体现在家庭里，也能体现在工作上，更能实践在群众中。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，培育和传承良好的家风既是对家人的爱护，也是对事业的负责、对社会的担当。

“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”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家风上作出了典范。毛泽东是子女的严师，又是子女的慈父。他对子女，身教重于言教，在思想上要求严格、学业上督促指导、生活上关心爱护，尤其注意防止子女在思想上、生活上的特殊化倾向。邓小平家风十分严格，邓家吃饭，孩子们每次都要把碗里的饭吃得干净，不允许有剩，哪怕有一粒米掉在饭桌上都要捡起来吃掉。刘少奇的儿孙们各自有着不凡的人生，却大多默默地过着平凡的生活，其女说：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，但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，那就是要做自立、诚实和正直的人。周恩来夫妇治家无私，他们没有给后辈留下一砖一瓦、一钱一物，却为后辈留下了淡泊名利、严于律己、无私奉献的家风，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世人为之敬仰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家风好，就能家道兴盛、和顺美满；家风差，难免殃及子孙、贻害社会，正所谓‘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’”。

革命的家风源于中华民族家风文化的积淀。“一室之不治，何以天下家国为？”《礼记·大学》提出了儒家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念。诸葛亮临终前，在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家书《诫子书》中说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”，“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”。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告诫后世：“父子之严，不可以狎；骨肉之爱，不可以简”。唐代陈崇《陈氏家范》强调：“循矩斯方，受规则圆。非规非矩，遗羞皆贤。父兄之教，在所宜先”。宋代的士大夫家庭都很重视培养子孙的品行，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名人，都留下了家训，如范仲淹有《义庄规矩》，司马光有《家范》，包拯有《包拯家训》，黄庭坚有《家戒》，袁采有《袁氏世范》，陆游有《放翁家训》，赵鼎有《家训笔录》，朱熹有《朱子家训》，陆九韶有《居家正本制用篇》，叶梦得有《石林家训》等。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《朱子家训》提倡日常生活要注意勤俭节约的家风，饮水思源，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，成为传诵久远的名训，深深影响了后人的勤俭

培育和传承良好家风

□ 康井泉

行为。

古人讲：“家何以治？曰各自尽。”意思是说，每个家庭成员，都要各自对家庭尽责，共同遵守道德准则，互爱互助，全家人一条心，家庭就和和美美、纯纯朴朴、蒸蒸日上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领导干部的家风，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，而且关系党风政风。党员干部正家风要敢于“亮道、亮镜、亮剑”。亮道，亮为民从政之道、亮严格治家之道、亮清白处世之道，旗帜鲜明摆观点；亮镜，常常照照家里人是否勤俭持家、常常照照自己是否作出表率，对照反思常提醒；亮剑，对苗头细节亮剑、对各种诱惑亮剑、对不正之风亮剑，该制止时就出手。狠刹“奢侈风”“后门风”“人情风”，真正做到从我做起，从家管起，从身边人带起，越是担任重要职务、承担重要责任时，就越要有定力、有原则、有尺度，必须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好，真正赢得信任、赢得尊重、赢得民心。

